

文革回憶錄叢書



我親歷的 國防科委文革

惲仁祥 著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革回憶錄叢書

我親歷的 國防科委文革

惲仁祥 著

圖書館

東南大學

校友

惲仁祥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革回憶錄叢書

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

惲仁祥 著

責任編輯：林 濤

封面設計：胡 冬

ISBN 978-988-16347-2-6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2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12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 33 號豐盈工貿中心 5 字樓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 00852-3921 6033

Fax : 00852-2528 5333

網址 : <http://www.cccpress.com>

Email : info@cccpress.com

: sales@cccpress.com

發行：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地下

G/F, C&C Building,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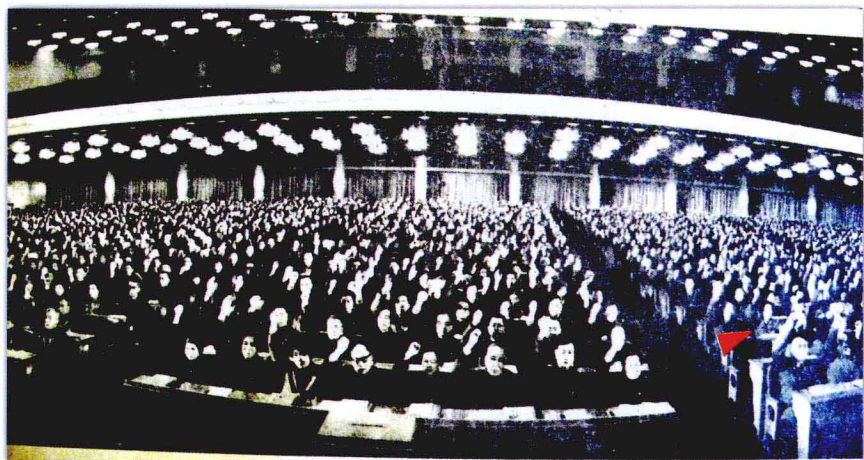
Tel : 00852-23818251

Fax : 00852-23971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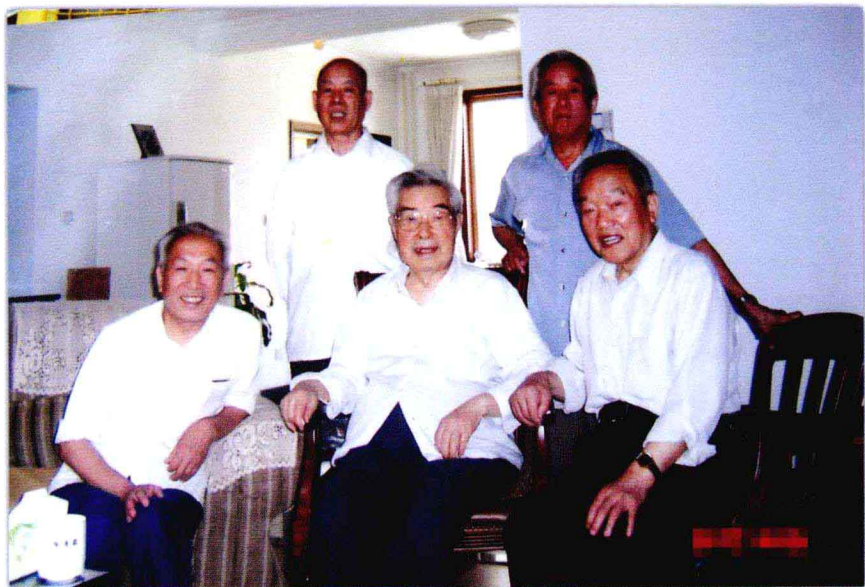
定價：HK\$ 110 元



■毛主席像：惲仁祥於
1968年8月繡



■作者在全國四屆人大會上(1975年)。箭頭所指為惲仁祥(第三排)；
作者右邊為總後政委郭林祥；前第一排(左一)為張愛萍



■ 2007 年和原國防科委司、政、後戰友探望陶魯笳同志。左起：尹香金、尹同太、陶魯笳、憚仁祥、康華清



■ 2011 年 5 月 25 日原國防科委司、政、後戰友在八寶山向陶魯笳同志遺體告別時留影。左起：湯月英、憚仁祥、李敏、康華清、劉宗仁、尹香金

序言：為文革正名的一篇佳作

林伯野

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發動和領導的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可以和法國巴黎公社、俄國十月革命相媲美的衝天創舉，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防止蛻化變質，與舊制度、舊觀念徹底決裂，向全人類的徹底解放前進的必由之路。

可是，自從毛澤東逝世，文化大革命被扼殺、被否定、被歪曲、被妖魔化以來，三十多年過去了，謬論橫流，莫衷一是。文革真相，極需澄清。惲仁祥同志的《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就是一篇為文革正名的佳作。

他不但親自經歷了文革，而且以一個真正的造反派的身份參加了文革。他不但是造反派，而且是一個相當大的部門——國防科委的知名造反派頭目，因此，他不但寫了很有份量的大字報，他反映的情況，得到了毛主席親自批示支援。他向中央文革反映重要情況，還得到過江青同志寫信回應和支援。他參加了革命的三結合，並曾擔任該單位黨組副組長。陶魯笳、錢學森等領導親自蹲點並支持過他。當造反派挨整時，他也被打擊、被關入私設的“監牢”，被無理中止工作。我們可以從他的經歷中，從一個側面瞭解到文革的全過程。

若干年來，寫文革回憶錄的人已很多了，有的人立場不對，方法不對，自然寫不出高品質的作品。惲仁祥同志既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又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他生長在一個被日本鬼子和國民黨反動派搞得家破人亡的革命家庭，是共產黨、新中國解救了他。他的哥哥在他少年時已是共產黨員。解放不久，他加入共青團，成了基層幹部。是共產黨培養他從中學到大學，參軍，搞國防科研工作。由於他有這樣的經歷，他能有堅定的正確立場。

本書引用了大量資料，這說明作者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唯物論原則。文章中運用了文革時期和現實生活加以比較的方法。他說：“毛主席關於奪取政權，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關於歷史的週期律；直至他晚年明確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系列講話，如果 30 年前不理解或不甚理解，則近 30 年共產黨資本主義化的現實教育，就完全能理解了。”

作者的語言明快而深刻，如：“抹不黑的毛澤東，塗不紅的走資派”；現在是“吃了前人的，用了後代的，剩下是給美國的”等，使人讀起來不感枯燥。

文章揭露了軍隊高層某些上將甚至元帥的重大錯誤，由於這些情況鮮為人知，所以對瞭解歷史真相更加珍貴。

2011 年 5 月 25 日

林伯野：原南京軍事學院政治教員，曾經受過毛主席接見；後調國防大學政治教研室主任、政治研究所所長等職。現離休、副軍級。

抹不黑的毛澤東 塗不紅的鄧小平

——讀《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

肖衍慶

今年7月下旬的幾天，我到京郊延慶一家養生家園去避暑。為我們服務的青年同志知道我愛看書，就私下對我說：“肖老師，你就在家看書吧。”這樣，我一連看了4天書，一口氣讀完憐仁祥同志寫的《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一書（以下簡稱《親歷》），深感這本書是目前反映文革的一本好書，值得我們大家認真討論一番。

好在什麼地方呢？我想從以下三個方面談一下我的感受。

（一）它全方位描繪和捍衛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作者是寫親歷，所以他能把他的親歷的單位文革過程同整個文革過程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反映出文革的全貌，又能看出文革在一個單位的展現。這就使人對文革的認識有了一個立體感。

有人說，這本書攻擊了聶榮臻元帥、張愛萍這樣的將軍。我不這麼看，聶榮臻這樣的元帥，張愛萍這樣的

將軍，他們在文革中的表現，說明他們是文革的反對派。他們的這種態度，連毛主席、周總理都看出來了，批示要徹查他們的問題。如果聯繫到他們在鄧小平翻案復辟中的表現，那他們都是貨真價實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誠然，他們各自都曾為人民做過一些好事，也和鄧小平有過一些矛盾。但是，走資派這個總定性決定了他們和人民的根本對立。

在文革期間，毛主席反覆教導我們，要從路線上看人看事。他在病重時曾對華國鋒說：“葉劍英也是一個對文化大革命極端不滿的分子，再不要讓他插手軍隊的工作了。這兩年軍隊的情緒不穩定是和他有關係呢。許多政治謠言，和他有很大關係呢。”我從這本書第一次看到這段話，立馬感到華國鋒是地道的叛徒。毛主席把這話都向你交了底，你竟然和葉劍英勾結起來抓捕“四人幫”，這絕非一般私心所致，是明顯的背叛行為。

從路線上看人，就是要看他對文革的態度。對葉劍英，毛主席是這麼看的，對周總理，毛主席也是這麼看的。他說：“總理組織上是緊跟我的，思想上是跟劉鄧的，他並不真正理解文革。”我想，總理對文革理解的局限性，恐怕就是對鄧小平的認識上。在生命的最後的日子裏，他把黨和國家的危險性放在“四人幫”身上，而把希望寄託在鄧小平復出上。當然，當毛主席部署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以後，他就停止了一切保鄧的活動。即使葉劍英派了兩個人，拿著兩張紙，日夜守候在總理身邊，想記錄下總理說出對他們有用的話。結果，一個字也沒有等出來。總理沒有違背“組織上緊跟毛主席”

的原則。

毛主席這樣看人看錯了嗎？沒有。歷史的發展，證明了毛主席這樣看人是極富遠見的。我常想，連總理都不能真正理解文革，我們自己呢？難道沒有重新認識的必要嗎？所以，有的同志提出：重新認識毛澤東。我認為這是當今首要問題。而重新認識毛澤東的要害，就是重新認識文革。

作者正是根據這一點，向我們描繪了聶榮臻這樣的元帥、張愛萍這樣的將軍，在文革中的真實表現，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去相信，反而認為這是“攻擊”呢？這說明至今我們有些人就是不願從路線上看人，特別是不願從對文革的態度上看人。如果是這樣，那他們的“革命”，又從何談起？

毛主席為什麼把對文革的態度作為識別人的標準呢？這是他老人家對自己辦的第二件大事意義的深信不疑。全世界一百多個共產黨不信馬列，社會主義陣營諸多國家變修。面對這樣一個嚴峻的形勢，毛主席以開天劈地的氣概，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原則運用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掀起人民群眾參加國家管理的偉大實踐。從此以後，凡是站在這個實踐的紅線上，就是革命派；凡是不邁這個門檻的，就是不革命派，甚或反革命派。這個標準將持續到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實現。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本書對聶榮臻、張愛萍的揭露，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它讓沒有參加過文革的人，可以看透這些昔日的功臣是怎樣變成革命罪人，從而看

到文革的必要性。正是耀眼的“元帥”、“將軍”這些頭銜，增加了人們識別他們的困難。他們從政治上的反動，到生活上的腐化，就使他們必然選擇資本主義道路，而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

《親歷》在捍衛文革方面幾乎是全方位的。凡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給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編造的謠言和事件，它都給以撥亂反正。這反映出作者巨大的政治勇氣。

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發動文革，是幾億人民參與的偉大革命運動，又是長達十年的革命運動。反革命修正主義者要翻案復辟，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為了這一點，他們利用他們在黨內那點騙人的威望，不顧一切廉恥地編造謊言和事件，企圖欺騙人民跟著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最害怕的就是文革，全面否定文革自然就成為他們起家的基石。他們急急忙忙給天安門事件平反，急急忙忙給劉少奇平反，急急忙忙做“決議”，徹底否定文革，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但是，謠言和詭辯，不但逐漸被他們的翻案復辟活動所打破，而且使文革的光芒重現在人們心頭，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成為人民在黑夜中的燈塔。劉少奇、鄧小平成為人民最痛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頭子。

就說劉少奇。他們原本以為給平了反，文革就站不住了。誰知鄧小平的翻案復辟，把劉少奇那條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修正主義路線“克隆”得惟妙惟肖，淋漓盡致。劉鄧原是一條藤上的瓜，這在老百姓心裏是明鏡似的清楚。

《親歷》抓住六十一個叛徒集團案中的《反共啟示》

的反動實質，就把劉少奇這個叛徒的嘴臉揭露無遺。1935年11月，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們以“全國救亡工作緊張，北方局幹部缺乏”為由，策劃了一個要關押在北京軍人反省院一批黨員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的計畫；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張聞天背著毛主席，以中央名義批准了北方局的這個決定。這個決定傳到監獄，反省院的黨員不相信，沒有執行。後來組織催促，他們才發表《反共啟示》出獄。文革中，紅衛兵把當年發表在報上的《反共啟示》寄給中央文革小組，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視。

1967年2月3日，毛主席會見阿爾巴尼亞外賓時說過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打倒的人中，有些過去是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在報上登反共的啟示。那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麼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這些方面，紅衛兵小將是有功勞的。”

從毛主席這段話裏可以看出，這個《反共啟示》要害的兩句話，就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在這樣的書上簽字，不是叛徒是什麼！所以獄中的共產黨員憑著起碼的覺悟也會拒絕簽字。但是，一作為“組織決定”，很多人就糊塗了。那麼現在看來，這個“組織決定”是背著當時黨的主要負責人毛澤東同志做出的，是地地道道的盜用組織名義組織的一次集體背叛活動。從解放後劉少奇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看，他策劃的這次活動不僅是他叛徒哲學的使然，也是他這條組織路線的早期反映。像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這些叛徒自然就成

為劉鄧司令部的骨幹。鼓動獄中黨員叛賣黨，然後再混入黨內，那些不堅定分子，能為黨好好工作嗎？具有叛賣思想的分子，不是內奸是什麼？因此，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是誰也摘不掉的。毛澤東把《反共啟示》事件看做劉少奇問題的性質變化的分水嶺，是十分有道理的。

有沒有對“組部決定”也不服從的共產黨員？有，這就是唯一位劉格平。對這樣一位敢於保持共產黨人氣節到底的人，劉少奇竟然恬不知恥地用叛徒哲學說服人家。解放後，劉少奇給他解釋說：“你不瞭解形勢，當時需要像你們這樣的人投入抗日戰線，發揮很大的作用，你不出來對黨的事業有影響，你自己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做不了多少工作。”劉格平說：“我不是不瞭解形勢，我瞭解形勢，也相信中央對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可是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看了《反共啟示》，於心不忍，我不能在上面簽字。既然是中央指示，別人出去我並沒有反對，只是我不能簽字。”這段對話，把革命者和叛徒的人格、心境對比得多鮮明。

在這叛賣成風的時代，我們耳邊不禁響起魏巍同志生命最後的遺言：繼續革命，不當叛徒！我們同樣喊出：捍衛文革，不當叛徒！

（二）它全方位揭露和批判了“改革開放”

作者像是給“改革開放”安放了全方位的攝像頭，在《親歷》裏，幾乎可以看到“改革開放”30多年間全

部的罪惡和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這種揭露，往往是同捍衛文革相聯繫的。有時是為了捍衛文革而揭露“改開”，有時為了揭露“改開”而對比毛澤東時代。這種巧妙的對比方式，使人讀起來很有感染力和說服力。作者能做到這一點，那是要有很強的鳥瞰式的觀察力。

比如關於文革中武鬥和死人問題。這是我國走資派抹黑毛澤東的一個慣用手法。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三千萬人，右派製造的這個謠言，竟然成了中央政治局多次討論通過的黨史二卷的官方數位。最近有文章揭露，最早的 1700 萬數字的研究者也聲明這個數字沒有經過核實。這個數字在 80 年代能作為國家研究課題提出來，就是一種挑釁性的問題。據說 1985 年 6 月，我國有關官員參加一次國際人口科學研究會，便產生了“研究中國大饑荒期間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願望”，這個願望很快就變成了“國家研究課題”。很顯然，這是有意配合當時抹黑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潮流。最早的研究專家竟然在“因我手頭沒有詳細資料，許多計算結果都在手稿等資料堆中，要待我有機會再來整理”的不準確的境況中，就公佈出 1700 萬非正常死亡人數。對於這樣一個演繹過程，知情人應該徹底揭露。

《親歷》根據右派們這樣不顧事實的捏造，在揭露他們誣譏文革武鬥和死人問題時，巧妙地提出“看看究竟是誰在屠殺人民？”這個對比太重要了。人們清楚地看出，文革是保護絕大多數人民的。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質。從黨中央、毛主席那兒早就明令要文鬥、不要武鬥。凡是發生武鬥的地方，都有走資派和階級敵人挑撥的身

影；甚至武鬥的槍支就是他們發的。相反，走資派搞資產階級專政、法西斯專政，直接鎮壓人民，槍殺無辜愛國學生和市民，暗殺知情的公安幹部，逼死敢與反抗他們的仁人志士。所謂三次嚴打，更是不知錯殺了多少冤魂。至於黑監獄、黑磚窯、黑煤窯、黑礦難，連同鐵路、公路不該發生的事故，死難的同胞更是不計其數。還有因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或生命所迫而走上絕路的人，更是遍佈全國各地。

在這一條裏，我建議再加一個內容。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鬼變成人，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人變成鬼。你看“改開”以來，有多少人倒在金錢和石榴裙下。前幾年，有網文說，倒下的超過了淮海戰役的傷亡人數；現在，這個數字要翻幾番哩！（本書作者註：現在每年非正常死亡800萬，30多年是多少？誰敢計算；另外1億多人“被精神病”、5000多萬人喪失生育能力）。

文革期間，毛主席有段話說：“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三個“根本區別”把兩條路線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區分得清清楚楚。看看7·23動車追尾事故發生後，那些官員的表現，從總理到部長，從處理事故的官員到現場指揮的人員，對死傷群眾冷漠、欺騙、威逼到難以置信的程度。這和當年《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是多麼天壤之別。

《親歷》的揭露是準確而辛辣的，批判也是擊其要害的。作者抓住“決議”反覆批判，指出它是“鄧小平的

自供狀”。“決議”的出籠，就充分暴露了鄧小平的兩面派嘴臉。他曾一再講：“對於文化大革命，我們還是要肯定。”“不能輕率地否定”，“不想匆匆忙忙地總結”，甚至說：“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9頁）。

可是，他這話說了一年多點時間，就組織人起草“決議”。他研究了嗎，他理解了嗎，統統沒有，完全是按照他預謀的全盤否定文革的結論，強加給全黨。連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看了這個“決議”，都說鄧小平要食言了。毛主席說“‘永不翻案’靠不住”，果真如此；毛主席沒有看錯人。“決議”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的內亂。這個結論現在連修正主義集團的骨幹分子都難相信了。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七·一”講話就說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雖然他也是否定文革的。

“決議”不僅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復辟的絕路，也給修正主義集團手裏塞進了一個定時炸彈。“七·一”前夕，所謂中共第五代智囊張木生（《中國稅務》雜誌社長或總編）接受共識網主管的採訪時說：“中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了。”危險到了什麼程度呢？他說：“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中國走在錯誤道路上，要拉回一點。”雖然張木生的話隱含了主語，但不難猜測他所指的便是中共現任領導。而他的這番話，外界認為是第

五代接班人對胡錦濤不滿公開了。這個定時炸彈不論傳到誰的手裏，都有爆炸的那一天。

現在，海內外都在議論中國天天發生的奇聞奇事，說：“中國怎麼啦？”一位網友形象地回答說：“據說棋盤讓二奶吃醋打翻了，黨和國家領導人正在滿地找棋子呢！”

（三）要正確認識文革，首先要正確認識自己

毛主席在文革中還有這樣一段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這段話是毛主席關於文革最精彩的論述。

我花了兩天時間，讀了項觀奇同志《重新認識毛澤東，重新認識鄧小平》，又花了四天時間，讀完了惲仁祥同志《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就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他們都能深刻地闡述文化大革命，闡述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理論？因為他們都是以毛澤東的戰士身份投身文化大革命的，並且把這種身份堅持到現在。這啟發我們，只有以共產主義者的世界觀，才能觀察文革的真正意義。其他的思想，只能在文革門檻外徘徊。

最近，一家紅色雜誌刊登一位老幹部對文革的反思。作者說他也是從文革開始“很不理解”，到文革結束時“徹底否定”，直至後來在事實面前的變化過程。他說：“文